

古典目录学研究的新境界*

——徐有富教授《目录学与学术史》评介

孙振田

摘要 徐有富教授的目录学新著《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的出版将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理论上,该书作者对历代目录所构成的通代学术史性质有着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历代目录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史的缩影”。方法上,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精心选择富有代表性的目录著作进行目录学研究,与宏观的学术史建构;其二,紧紧抓住目录本身的要素特点,精心设计研究论题,进行目录学与学术史的研究工作。成效上,表现为学术史研究内容的丰富与扩大。该书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参考文献 12。

关键词 《目录学与学术史》 古典目录学 学术史研究

分类号 G257

ABSTRACT Doctor Xu Youfu's *Bibliography and Academic History* raises the research of classical bibliography to a new state. In theory, Doctor Xu has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eral academic history built with the bibliographies of the past and points out that "in fact, the bibliographies of the past ages are the miniature of academic history of china". On methodology, the book has two points that merit attention: one is to choose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with great care to study bibliography and to build a macroscopic academic history; another is to 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ibliography and design the topic carefully for the research of bibliography and academic history. The book has expended the field of academic history.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mistakes in the book. 12 refs.

KEY WORDS *Bibliography and Academic History*. Classical bibliography. Research of academic history.

CLASS NUMBER G257

继 20 世纪与程千帆先生合著《校雠广义》(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之后,作为南京大学的《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之一,徐有富教授又推出了自己的目录学新著——《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据作者介绍,该书的撰写经历了应程千帆先生之嘱写作《中国目录学简史》、申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项目并按时写出初稿、参与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目录学与思想史”的写作任务、“放弃原稿、从头再来”等几个阶段^{[1]后记},因此,该书实为作者多年来从事古典目录学研究的结晶。全书共九章,四十五万字。笔者认为,该书的出版将会把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从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编撰《别录》、《七略》

开始,古典目录学就形成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然而,直至清代中叶,章学诚方明确地从理论上提出目录之学要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甲乙部次,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者,千百之中,十不一焉。”^{[2]945}在其看来,一部质量较高的或者说能够达到“学”的高度的目录应是那些能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受时代的局限,章氏此论所要解决的主要是单部目录著作的编撰问题,即如何通过目录的编撰彰明学术源流。这从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中国著名目录学家个案研究——姚振宗目录学研究”(编号:09YJC870026)子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流”为理论指导对《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等展开的批评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章氏实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手段主要包括:要注意类例的划分,通过类例的划分来考察并明晰学术的发展等,所谓“学问贵知类,知类而又充之,无往而不得其义也”^{[3]617};互著与别裁;撰写序文(包括大序与小序);编制专科目录,通过辑录一书的有关材料来考证学术的发展等(可参其《史籍考》的编撰体例)。这一理论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似未能引起目录学界应有的重视,明确以之为目录编撰的理论依据。直至清末,目录学大家姚振宗方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论应用到目录学研究实践中去,并以卓著的成就将古典目录学研究推至一个新的高峰。所撰《师石山房丛书》七种(详后)，“自黄虞以迄先汉,学术流别,胥在于是”^[4]，“自三代秦汉以迄隋唐间之学术流别,靡不犁然可考焉”^[5]。从方法上来看,《师石山房丛书》包括目录的辑佚、拾补、补正史艺文志、目录著作的考证等,即通过目录辑佚展示目录学发展之源及相关学术情况(《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通过目录拾补、补正史艺文志反映学术之不足,使当代学术得到更为全面的展示(《〈汉书·艺文志〉拾补》);通过正史艺文志的补撰以反映当代学术的面貌(《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通过对目录著作的考证,例如对其编撰义例进行发明、对其著录的书籍进行考释等,对相关学术及其发展进行梳理(《〈汉书·艺文志〉条理》、《〈隋书·经籍志〉考证》)。姚氏虽然没有明确从“史”的角度予以说明,然而,从《〈七略别录〉佚文》到《〈隋书·经籍志〉考证》,客观上已经构成了从先汉至隋唐间的通代学术史。这表明,章学诚所谓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上都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显而易见,姚氏将多部目录研究著作排列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庞大的学术系统,较之章学诚较多地关注单部目录的编撰来说,其在目录学史上无疑是一大贡献。

近代以来,随着章学诚的被“发现”以及古

典目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日益成为古典目录学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基石。一些学者以之为前提提出进一步的阐释,如余嘉锡先生指出:“……章氏又括之以二语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由此言之,则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6]30}此论对目录的学术史性质作了明确界定,无疑是对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进一步发展。从“综其体制,大要有三”云云看来,余先生与章学诚相同,仍然是着眼于单部的目录作品。而且,余先生并未能沿着“史”思路展开具体的目录学研究工作。尽管如此,当余先生对目录作了学术史性质的界定以后,实际上也就提出了另外一个命题,即如果单部的目录著作大致可以看作是断代的学术史的话,那么,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直至近代以来大量琳琅满目的目录著作实际上也就构成了一部通代的学术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新的命题同时也摆在了研究者面前,即如何将目录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紧密结合,从目录来考察学术史,再从学术史来反观目录,既充分挖掘古典目录的价值内涵,又进行通代的学术史建构。遗憾的是,余先生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无人做这样的尝试。直至20世纪90年代末,高路明先生出版《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7]一书,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是书共七章,第一章为“古籍目录分类的沿革与中国古代学术的演变”,第七章为“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中间各章为对汉至清一些主要目录的介绍与研究。虽然高先生在“后记”中指出该书为“从目录的角度谈学术”,而实际上目录学研究的内容相对多一些,学术研究的内容则相对弱一些。如第五章分为三节,分别为“明代的政府藏书目录评析”、“明代的史志目录评析”、“黄虞稷对目录学的贡献”,所论包括《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国史经籍志》、《明书·经籍志》、《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稿》、《明史·艺文志》等,论述内容则主要包括编撰过程、分类情况、著录情况等,于相关的学术方面的论述明

显偏少。尤其是作者尚无以目录学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勾勒通代的目录学与学术史的主观意图,这也决定了该书未能在理论及实践研究两个方面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尽管如此,该书毕竟在目录学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值得肯定。如何将目录学与学术史研究紧密结合,构建通代的目录学与学术史体系,还需要有新的论著问世。

徐有富教授的《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正是基于这样的目录学背景所产生的一部力作,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从理论上讲,徐教授对历代目录所构成的通代的学术史性质有着清醒的认识:“目录实际上是记录人类精神财富的数据库,中国历代目录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史的缩影。”^{[1]后记}以这一思想为指导,徐教授采取以目录学与学术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构建自己通代的学术史:“本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说明目录学与学术史之间的密切的关系,具体分析目录学是怎样‘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并且论证书目具有学术史价值。”^{[1]导言}这里,“论证书目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以目录学研究为基础,构建通代的学术史的过程。从章学诚的目录要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到余嘉锡先生单部目录的“目录者学术之史也”,再到徐有富教授“中国历代目录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史的缩影”,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递进与提高的过程,彰显出古典目录学理论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因此说,徐教授“中国历代目录实际上就是中国学术史的缩影”说可以看作是自章学诚以来对古典目录学理论的又一重要贡献。

在研究方法上,《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也进行了极为有益的探索,颇具示范性意义。其中,有两点尤为值得注意:

其一,精心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目录著作进行目录学与宏观的学术史建构。所选目录在目录学上具有代表性,在学术史上则要求能够反映当代学术的发展面貌。正史艺文志因其特殊的地位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作者的首选,《汉志》、《隋书·经籍志》(下称《隋志》)、《新唐

书·艺文志》(下称《新唐志》)、《宋史·艺文志》(下称《宋志》)皆在所选之列。唐代正史目录除了《新唐志》外还有《旧唐书·经籍志》一种,作者之所以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是因为后者对开元以后近二百年的图书没有著录,不能全面反映唐代的藏书与著述情况,因而也就不能全面反映唐代学术的发展情况。《明史·艺文志》亦不在选择之列,因为其是据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删节而成,“资料远不如《千顷堂书目》丰富,而且也不象《千顷》那样于书目卷数之外,更著撰人略历,可供参考。”^{[1]269}元代部分则选择有清一代著名元史学者钱大昕所撰《元史艺文志》(下称《元志》),该志在多部补元史艺文志的著作中收罗最广,编制亦最精,大致能够反映元代学术的发展状况。清代则选择两部目录: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与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前者编撰于清代中期,后者编撰于清代晚期,时间上有一个跨度,于反映清代学术的发展无疑更具代表性。对于一些私家目录,如阮孝绪《七录》亦在选择之列,虽然该目已经亡佚,但其序、目录及《古今书最》等尚保存在《广弘明集》中,可借以考察当时的学术发展状况。当然,作者也并没有忽略另外一些目录,如《汉志》研究部分又论述了刘向的《别录》与刘歆的《七略》,《宋志》研究部分又结合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尤袤《遂初堂书目》、陈振孙《直斋书解题》等进行论述。从《汉志》到《七录》,再到《隋志》、《新唐志》、《宋志》、《元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徐教授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目录学发展的轨迹,同时也为我们描述了两千多年来洋洋大观的学术史是如何发展的。如果将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七种看成是一种学术史建构并以之作为比较的话,我们就更能看出徐有富教授精选从《汉志》到《书目答问》进行学术史建构的意义之所在,因为前者的建构毕竟仅至《隋志》而止,并不完整,而徐教授的建构则是完整的。

其二,紧紧抓住目录本身的要素特点,精心设计研究论题,进行目录学与学术史的研究工作。关于这一点,作者已有说明:“目录的分类(含类目的设置与否、名称、位置及类目的变化

等)、著录项目(含书名、作者、稽核、版本、提要、附注等)及其统计数据、书目的序(含全目之序、大类之序、小类之序),以及按语等,都能客观而集中地反映各时期学术的发展变化。”^{[1]后记} 全书也正是以这些要素为切入点进行目录学与学术史的研究工作。当然,仅仅抓住这些要素还远远不够,最为关键的还在于要围绕这些要素进行研究论题的设计,只有论题设计合理、恰当,并围绕这些论题展开相关的论述,才能使目录学的研究得以深入,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其学术史价值,并进行学术史的建构。举例言之,《汉志》研究六艺略部分的论述共设计了十个论题:①何谓六艺;②孔子将六艺变成了六经;③为何称六艺略而不称六经略;④六艺略为何置于《汉志》首位;⑤为何将《易》类置于六艺略之首;⑥汉武帝特别重视《春秋》公羊学;⑦史学处于附庸地位;⑧汉代经学重家法;⑨《孝经》为何置于六艺略;⑩汉代强调通经致用。或就其称名给予解释,或就其著录次序加以探讨,或就其体例进行申论,既对《汉志》之六艺略进行了目录学研究,深挖其价值内涵,同时又进行了学术研究与学术史的建构工作。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些论题中,“何谓六艺”等九条与《汉志》本身的目录学要素较为密切,为根据这些要素而设计。而第10条“汉代强调通经致用”的设计则不尽相同,为根据汉代大的学术史背景而设计,与大的学术史背景的关系较为密切。该条的设计依据显然已经超出了《汉志》目录学要素的范畴,也因而尤能显示出作者考虑之周全,匠心之独运。因为如果仅据《汉志》六艺略文本本身来看,受其先天客观因素的局限,例如信息传递的概括性、有限性等,并不能直接反映出这样的学术内容。因此说,该条的设计既是对《汉志》六艺略目录学价值的深度开掘,又是对其学术史阐释价值的完美补充,意义重大。全书有不少类似于第10条这样的论题,如:《汉志》研究诸子略部分的“诸子乃私家之学”、“法家之学不可废”;《隋志》研究部分的“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经学参以玄言”、“经学由章句向义疏过渡”;《新唐志》研究部分的“经学趋于统一”;《元志》

研究部分的“用经学为政治服务”、“理学北传”、“和会朱陆”等。正是这些基于学术史大背景的论题的设计,才使全书的学术史建构工作得以最终完成。这些论题在中国学术史上都属于重要的节点,颇能反映学术发展之大势。全书共设计论题262个,皆能提要钩玄,切中肯綮,而其研讨之细密于中亦可略窥一斑。

从研究成效来看,该书呈现出诸多的鲜明特点。以学术史的研究为例,由于与目录学的研究紧密结合,其研究内容得到了丰富与扩大。通常意义上的学术史研究著作因其切入角度、撰写体例及研究重心之所限,对于一些内容往往不能包含在内,即使这些内容本来就很重要,不应该被忽略。而目录则因其著录书籍的全面性与多样性,一方面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直接的切入点,与此同时也要求相应的研究著作必须也具有全面性与多样性的特点。举例言之,《汉志》数术略之天文类,序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历谱类,序云:“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8]1765,1767}《汉志》方技略之医经类,序云:“医经者,原人血脉经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房中类,序云:“房中者,情性之极,至道之际,是以圣王制外乐以禁内情,而为之节文。”^{[8]1776,1779}等等。不难看出,至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数术与方技二种与帝王包括平民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甚至可以理解为他们的政治活动或日常生活的指导之术,是当时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学术史的研究理应顾及它们,而不是弃而不问。而一般的学术史著作却很少涉及,如张国刚、乔治忠等著的《中国学术史》^[9],其第一章为“中国传统学术源头的先秦时期”,所论包括“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曙光”等三节,于数术及方技并无论及;其第二章“以经学为核心的汉代学术”,所论包括“汉初学术之状况”等七个小节,于数术、方技二略亦没有论及。又如另一部学术史著作卢钟锋所著《中国传统学术史》^[10],其第一章为“先秦时期

子学思潮的兴起与传统学术史的滥觞”，第二章为“西汉初的子学余绪与诸子学说史论的问世”，第三章为“西汉中的儒学独尊与正史儒学史卷的确立”，于数术、方技同样亦无论及。而《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则从《汉志》的文本出发，根据其数术、方技二略的著录情况设计了三个论题进行论述：①数术类著作颇受重视；②数术类著作充满迷信成份；③方技水平不高。虽然《汉志》数术、方技二略的书籍多已湮没不存，研究资料匮乏，徐有富教授无法对之展开较为详细的论述，但其能够设立专门的论题，已经多少起到了补充与纠偏的意义。全书中类似于这样的论题比比皆是，也正是这些论题使全书真实而又全面地反映了学术史的发展与演进，从而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学术史研究样态，此消彼长，皆赫然可观，大大地丰富了学术史的研究工作。

就微观言，该书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对于一些具体的目录学问题的研究，尚有进一步研讨的空间。以《汉志》之不立史部问题为例，徐教授径直采纳了阮孝绪的史书因其数量较少而附著于《春秋》类的说法^{[1]18}，而实际上，这一问题并非这么简单。考《春秋》类的序文“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云云，以及《汉志》对《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所作的注文中皆含“记”字等等^{[8]1714}，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规律性的对应关系——都包含有“记”字，再加上“古之王者世有史官”云云所揭示的不仅是《春秋》经的学术之源，也是《世本》等史书的学术之源，可以断定，史书本来就应该著录于《春秋》类中，只不过《春秋》类既然依《春秋》经而立类，史书就不得不著录于后罢了，即阮说未为圆照。再以《汉志》之《孝经》类著录有《尔雅》、《小尔雅》、《古今字》等书为例，徐教授云：“《汉志》将《尔雅》三卷二十篇、《小尔雅》一篇、《古今字》一卷归入《孝经》类就不恰当。”^{[1]314}这亦似未尽然，在笔者看来，《尔雅》等实际上并非著录于《孝经》类

中，而是著“杂”于末——以“杂”书的身份著录于整个《六艺略》（小学类除外）的末尾，因与《孝经》类直接相连，看起来也就像著录进了《孝经》类中^[11]。与此相类，徐教授以《隋志》将《尔雅》等书著录于《论语》类为“不恰当”、“不科学”的说法，亦存在类似的问题^{[1]129,314}。《尔雅》等书在《隋志》中的著录实质仍然为著“杂”于末——著“杂”于整个经部（小学类除外）的末尾，而非著录于《论语》类中。又比如关于《隋志》没有如《七录》那样设立杂文部，而将相关书籍著录于总集类中，徐教授认为《隋志》的这种做法“似不妥”^{[1]124}，这当然有其道理，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仅仅指出“似不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古典目录中，某一类别中所著录的书籍与该类的称名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错位”并不鲜见，换言之，《隋志》将原本著录于其中的书籍著录于总集类中，或非问题。再如《新唐志》研究部分，徐教授引述了台湾学者许世瑛先生《中国目录学史》中的一段话^{[1]169}，而未作辨析。实际上，这段话大有辨析的必要，因为许先生也没有意识到古典目录中的“错位”问题，故所论未的。如此看来，研究者在以目录为切入点或者利用目录进行相关的学术研究时，仍然不能忽略对目录本身一些问题的研究。至于该书存在的其他问题，如有些断语稍失主观、文字校对尚有遗漏、少数材料的处理不够规范等等，本文不详细介绍。

章学诚又云：“由刘氏之言，以博求古今之载籍，则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中六艺，宣明大道，不图为甲乙纪数之需，亦已明矣。”^{[2]952}而程章灿先生在谈到《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的文化使命时亦云：“整理典籍，阐释国故，发古典之新义，阐旧邦之新命，这是文献传承的核心内涵，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12]从章氏之“大道”到程章灿先生之“新命”，古今竟能不期而为同调之鸣，让人感佩。而从中我们也不难领悟徐有富教授多年来孜孜矻矻坚持古典目录学研究之深意。

《中国专业图书馆发展报告 2010》出版

2011年2月,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秘书处组织、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馆长张晓林主编的《中国专业图书馆发展报告 2010》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专业图书馆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在科学研究、经济建设和行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着核心作用。《中国专业图书馆发展报告 2010》是我国第一份关于专业图书馆的年度发展报告,集中展示了专业图书馆的发展状况。

《中国专业图书馆发展报告 2010》包括国家科技图书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中国农业科学院图书馆等 24 个情报机构的专业报告以及汤森路透科技信息服务工作报告和两篇研究型文献,体现了专业图书馆区别于其他类型图书馆的鲜明特征,包括特色资源、特色服务、改革创新思路、年度成果项目和年度研究热点等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专业图书馆的发展状况,也预示了未来发展的趋势,对研究专业图书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该报告是在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的组织协调下,由各专业情报机构共同参与完成,体现了专业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作为市场化信息服务主体的汤森路透集团的参与,更体现了图书馆合作意识的提升和合作领域的拓展。

《中国专业图书馆发展报告 2010》可供图书、情报、信息管理等机构和专业的管理者、研究人员和师生参考。

参考文献:

- [1] 徐有富. 目录学与学术史[M].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 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M]. 叶瑛 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 章学诚. 史考释例[M]//章学诚遗书.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4] 姚振宗.《师石山房丛书目录》识语[M]//师石山房丛书. 上海:开明书店,1936.
- [5] 陈训慈. 师石山房丛书序[M]//师石山房丛书. 上海:开明书店,1936.
- [6] 余嘉锡. 余嘉锡说目录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7] 高路明. 古籍目录与中国古代学术研究[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8]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 [9] 张国刚,乔治忠,等. 中国学术史[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2.
- [10] 卢钟锋. 中国传统学术史[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 [11] 孙振田.《汉书·艺文志》著“杂”于末体例论[M]//国学研究,2010(25):395-407.
- [12] 程章灿.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总序[M]//徐有富. 目录学与学术史. 北京:中华书局,2008.

孙振田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通讯地址:西安市金花北路4号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邮编:710032。

(收稿日期:2010-09-13;修回日期:2010-11-02)